

经典作家

纪念

杨沫

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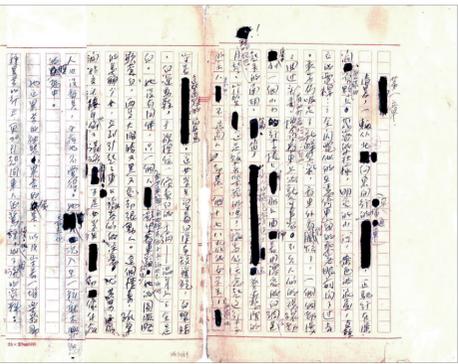


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湘阴，当代作家。《青春之歌》是杨沫的代表作，小说叙写了林道静从单纯的大学生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过程；也塑造了江华、郑瑾、卢嘉川等个性鲜明的信仰者群像。1958年1月《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阅读热潮，众多叫好声中也夹杂着批评的声音。对此，《文艺报》和《中国青年》开辟讨论专栏，茅盾、何其芳等文坛大家发表对此书的肯定性评价。杨沫汲取建议修改了小说的部分章节，1960年3月《青春之歌》第2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3版出版于1978年1月。《青春之歌》自发表到现在的60余年间，不断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音乐剧等其他文艺形式，小说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青春之歌》之后，杨沫又创作了《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它们构成杨沫的“青春三部曲”。

今年适逢杨沫诞辰110周年，本刊特邀学者程光炜和张曼昉，探究《青春之歌》版本变化的因由，勾勒杨沫多彩的创作人生。——编者



歌剧《青春之歌》剧照(国家大剧院版)。该剧由张千一作曲，赵大鸣编剧，王晓鹰执导。2023年4月初演，2024年10月复演。



《青春之歌》第一章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本专刊由《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经典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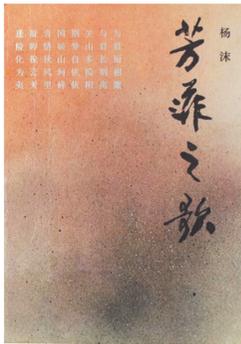
茅盾眉批《青春之歌》前后

——纪念杨沫诞辰11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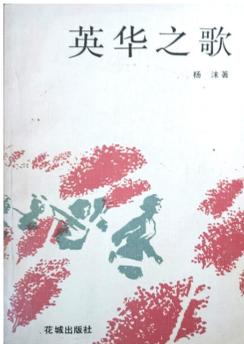
□程光炜



《青春之歌》，杨沫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初版本



《芳菲之歌》，杨沫著，花城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本



《英华之歌》，杨沫著，花城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本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1996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内含“长篇小说卷1”“长篇小说卷2”“中短篇小说卷”和“诗歌卷”，共四册。这套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资料，为茅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提到它，是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有一段因缘。

1959年，一位叫郭开普通读者批评《青春之歌》，他连续发表《略谈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中国青年》第2期）、《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艺报》第4期），使作家作品一时间“发发可危”。

郭开，据说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青春之歌》风波之所以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跟此人，也跟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约稿“组织”讨论有关，后者在刊载郭开《略谈》的“编者按”中这样说：

这两年，在我们文艺战线上，出现了不少反映现代生活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青春之歌》就是这些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它和其他作品一样，受到了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看了《青春之歌》后，很多青年同志向本刊编辑来信反映，认为这是一部好书，它塑造了卢嘉川、林红、林道静、江华这些光辉的共产党员形象，给每一位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也有某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本小说的缺点严重，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下面发表的郭开同志的意见，就代表这种看法。

今天重读这段话，会觉得与“编者按”所期待的效果正好相反，相当于“好事办砸”。一方面，它热情地肯定作品“成功塑造”了这些正面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却说郭开认为这本书“缺点严重”“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本来是在“拉架”，却“拉了反架”，差一点就让蛮横无理郭开占了上风。杨沫之子老鬼认为，母亲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大获成功，跟作品选择知识分子题材有很大关系。它引起很大争议，也根源于此。因为十年来重在倡导“为工农兵服务”，鼓励塑造“工农兵形象”，一下子来了一个“小资青年”（当然是向往光明和要求进步的青年），这样一来，编者按作者恐怕没有料到——这段“引导性”的评语，果真在文艺界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这是茅盾“眉批”《青春之歌》的背景。

二

据老鬼的《母亲杨沫》记载，到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弥漫全国，好评如潮”。但自反右运动后，部分群众和青年喜欢上纲上线，动辄佩人扣大帽子。时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的邢丽群在编委会上指出，对这种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现象，应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界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青春之歌》座谈会，认识了郭开，觉察到他是那种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的典型，于是向邢丽群汇报。邢认为这个典型很好，应该赶快组织约稿。郭写这篇文章，有它的“现实基础”；或说不是他“主动”要写的，而出自编辑的“组稿”意图。在后来的北影厂拍摄《青春之歌》前，众多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郭开这样说：当时《中国青年》电子管厂组织该小说讨论会，有些老工人对这部作品反感，批评《青春之歌》“写了很多讨党讨党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谨”。编辑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整理出来，他一开始没答应，因为未写过文章。记者又几次向他动员，还说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答应“帮他修改”。电子管厂老工人批评林道静的意见，其实也不是孤家，它与在《中国青年》《文艺报》上支持郭开的原因应该说不而面合。正如前面所说，本来是整理“典型”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撰写的“编者按”却却丢了这一典型现象，这更让郭开披露的“内幕”变得扑朔迷离。

郭开批评《青春之歌》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且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进行自我表现的；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尤其没写知识分子怎样与工农相结合；三、没有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因此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何其芳写文章是因《中国青年》约稿，以他当时身份——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诗人和批评家，本不该跟无名小卒计较。郭开“攻击知识分子”的言论使他对其观点一一驳斥。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流落着革命的激情的小说《青春之歌》，我已经读了两遍了。第一遍是在去年紧张的整风运动中，利用开会之余的间隙断断续续地读的。读完了后，我曾读过它和《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几部小说一起，“使我心里发生了欢喜之情”……这是因为我当时曾想到了一些五四以后的小说家的成名作。我所想到的这些成名作，除了少数特别杰出者外，在思想和艺术的成熟的程度上，很多是不如《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和《青春之歌》这部小说的。（《青春之歌》不可否认）

然后他笔锋一转，对郭文的“三点”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一、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批评过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作品，于是郭开就说《青春之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运行创作的”。这条断语明显脱离了《讲话》发表时的历史环境，对其作了“教条主义”的曲解，也与“全书的实际很不符合”（指这部小说）。二、郭文批《青春之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事实是，他也没有想到，“作者没有用较多的篇幅去写林道静和工人农民接触，去写她向工人农民学习了些什么。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情节的限制，也可能是受到作者的生活经验的限制”。在当时，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首先是与革命者接触，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这是符合历史情况的。三、郭开指责作品，“没有认真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因此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这怎么可能？《青春之歌》里面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作品里的革命知识分子”，“在牺牲是必要的时候，他们视死如归。他们用他们的血来创造明天，尽

管那是他们自己见不到的明天。读着书中关于这些人物的描写，我们会感到他们的血液还在我们身上流淌”——随后他提出质疑：这，难道不是在深刻而动人地“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吗？何其芳（1912—1977），诗人、学者和文学评论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四川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应该说，何其芳之所以如此“激动”，正是因为，小说中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形象，与他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高度的契合和精神感应。

三

郭开等对《青春之歌》的激烈批判，使这部刚冒头的“名著”几乎夭折，幸而何其芳借《中国青年》表明态度，也看到了这一形势。他们尤其是茅盾的亲自出面，终于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保留了这部“红色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文论和文学批评很多，但极少少公认为一位刚出道的作家辩评。既然郭开他们着重从“思想立场”的角度攻击杨沫，所以《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开始就从这里入手。茅盾说，最接近于《青春之歌》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讨论并不提出了作品正确评价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评价作品时思想方法的问题”（在当时语境中，“思想方法”是一个敏感词）。针对郭开的指责，茅盾的语气何其芳平复，却隐含着当时一般文学批评所缺乏的言外之意：

第一，《青春之歌》不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他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反帝时期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毛主席在著作中已经对它给予了正确评价，这是大家都学习过的。“我认为《青春之歌》的整个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于毛主席的论断的”。作品成功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几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党员形象，而且通过林道静“人生道路”印证了一个真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个人命运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才有真正的生命。”同时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

茅盾认为衡量一个作品的真正标准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它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他说，要正确理解这部作品，我们就得熟悉当时的情况，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代的事实，那就会犯历史主义的错误。茅盾的厉害，还在于下面这段话：“当然要从稳定工人阶级的立场，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评价；不过，‘光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而不求熟悉特定的历史事实，这就叫做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立场即使站稳，而观点却不会是马列主义的”。

第二，我们怎样评价林道静这个人？他指出，林道静虽是地主家庭的女儿，在家庭却是被压迫者，她还还想用她来“结交权贵”，这使她自幼就仇恨封建主义，要反抗，然而她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接触的也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她的个人主义，“她的反抗封建家庭是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的”。小说根据这个青年女子的历史条件，真实地描写了她所经历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亦即从反抗封建家庭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绝大多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寻找这个出路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了反抗封建婚姻，寻找个人出路；第二阶段逐渐意识到个人奋斗没有出路，个人利益要与人民的利益相结合；第三个阶段，则在党的教育引导下，认识到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工农大众的利益，于是坚决献身于革命。所以茅盾问到：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林道静的这条“道路”，难道不可以供青年们学习吗？

当然，茅盾也不掩饰这部作品的缺点，他认为主要有三点：一、人物，二、结构，三、语言。由于其他人物没有写好，使林道静在整部小说中始终过于“突出”，“好像是唯一的首先先觉和冲锋陷阵者”。小说结构过于“脱臼”，如第七章，基本脱离了林道静的遭遇这条主线，还有作品语言，它们或“色彩单调”，或“不够柔和”，都与她的“词汇不多”有关。

四

写这篇评论文章前后，茅盾觉得有些话没有说完，于是陆续

作家杨沫在修改自己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时说：“革命文艺不应当是装在套子里的、凝固僵死的木乃伊，它应当是放着金色的翅膀，高高地飞在云端、飞在高山大海、飞在无限广阔天地里的、永远激励人们前进的金翅鸟。”她的这一思想一直贯穿着她创作的始终，让其著作在众多的革命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杨沫在身体处于病痛之中却一直坚持创作多年，又历经坎坷才得以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她以自己的生活和成长为原型，描写了林道静、余永泽、江华以及卢嘉川等一批知识青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作出的选择，围绕革命、爱情、青春、抉择等关键词展开故事，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经典。如李扬所言，这“既不是因为它是一部政治寓言，也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言情小说，而是因为它是政治小说又是情爱小说，或者说，是因为它是一部情爱小说的方式讲述的政治故事”。显然，《青春之歌》作为一部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革命小说，不仅具有浓厚的女性知识分子气息，同时又因杨沫将“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话题与革命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丰富的意蕴和灵动的诗意诠释了知识分子话语、女性话语、革命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小说突破了简单的儿女情长，革命之中的爱情有了崇高性，一曲对生命的向往与追求的青春之歌回想着激情热烈的时代，为读者带来了新的文学体验。

《青春之歌》的三个版本

《青春之歌》于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并在《北京日报》上同时开始连载。这是《青春之歌》的第一个版本。该书出版后立刻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印刷近百万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4月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对《青春之歌》表示肯定，并说，最近有3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

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刊发表了一篇首次对《青春之歌》提出公开且严厉批评的文章，由此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文艺报》和《中国青年》上开辟了专栏登载了许多关于《青春之歌》的意见和评论。其中，有对此提出尖锐批评的，认为全书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主人公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不严肃，思想斗争上不深刻；但更多的则是对其《青春之歌》的赞赏和褒奖，认为此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而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人的形象也很真实且具有典型性。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中国青年》上连续讨论了4期，总编方群还专门请示过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的意见。”最后，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这“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何其芳也在文章中谈到“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并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

谦逊的杨沫认为这次讨论对自己非常有益，觉得其中确有正确的成分。为此她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1961年3月修改版《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青春之歌》的第二个版本。这一版最大的变动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的运动篇三章，同时也对某些人物和情节作了必要的修改，而杨沫最担心的两个角色卢嘉川和林红几乎没有任何改动。根据金宏宇先生的统计，《青春之歌》再版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改了260多处……再版本共计增写七八万字篇幅。杨沫认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确有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战争。她补写的这一段就是自己的亲身生活。而整个修改都是围绕林道静的成长和她所走的道路来进行的，这样的修改使小说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是非常必要的，对林道静的这一人物塑造的典型性也是十分有益的。之后面对这一版《青春之歌》的批评和质疑，她也一直坚持己见，并未恢复初版的原貌。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虽然“现在的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仍“不想恶俗，也不想颓废某些作者之作”，不能为了取悦他们就随意篡改。1991年6月，杨沫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我只能一心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足见其一生的赤诚情怀。

之后，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判和讨论，杨沫于1977年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再次对《青春之歌》进行了一次较大改动，1978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印本（定本）出版，这是《青春之歌》的第三版。杨沫在《印后记》中说：“这本小说在这次再版中，除了明显的政治方面的调整，其他有些有损于书中英雄人物的描写作了个别删改外，其他方面改动很少。”根据金宏宇先生统计，这个版本与1960年的版本相比，“修改有80多处，其中属于政治问题和英雄形象问题的改动有17处，其余的都是所谓‘其他方面’的改动”。

迄今为止，《青春之歌》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0万册，有包括英语、日语、印尼语、德语、西班牙语在内的20多种文字的译本，有助于《青春之歌》在海外的广泛接受，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经典在海外的成功传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流传，《青春之歌》英译本馆藏范围已遍布全世界，美国和日本也成为馆藏丰富且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

不仅如此，在60余年的出版发行中，《青春之歌》小说被陆续改编成连环画、话剧、京剧、川剧以及电视剧、音乐剧、歌舞剧等各种形式。1958年，因为《青春之歌》小说的巨大影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的同名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片，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放映，受到了轰动效应，很多影院甚至24小时轮映，依旧热播至今。该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1961年，邓颖超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不过一次，小说也看过‘忘食’。”2018年，适逢小说出版60周年之际，话剧《青春之歌》在北京四天之内连演五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导演罗锦晖看过之后不禁感慨道：“看过《青春之歌》引起了我的回忆……60年前，杨沫的小说问世，引起了我们一代人的阅读，几乎人手一册。”2019年，《青春之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经典丛书。

常常读新的《青春之歌》

杨沫在创作第一版《青春之歌》中比较重视人物成长的历史时间，而非具体的历史空间，因为在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史中，成长的主要是人，而非人物所在的环境。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她身处的环境并未与她一起成长，反而成为了她逃离和放弃的对象。到了第二版，也就是杨沫对小说进行修改时，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如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这时再审视小说人物所身处的环境时就会发现，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对旧社会北京城的“破败风貌”的描写能够更好地映射出北京城的“巨大变化”和“新生风貌”。于是杨沫在1969年12月《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中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二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

以青春的名义不朽

——谈杨沫与《青春之歌》

□张曼昉



作家杨沫像 杨之光 作

的那些情景。……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可是这情景，今天的天安门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

而到了今天，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京城发生了比第二版修改时更为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当时的北京城，了解过去时光风貌、地理环境中的人物影像和生活，无疑文学作品是极好方式。同样，也只有融入到当时当下的地理空间之中的人物生活才是真实可感、活色生香的。很显然，杨沫在写作小说不久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又不是通过简单的局部修改能够解决的，于是在第二版中已经作了一番较大的修改，但作品在风貌地理的展示上仍未对整体风格产生太大影响。所以杨沫才会在再版后记之中专门感叹了这个问题，她说：“《青春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我在国庆节前，从天安门前的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但不管如何，作者笔下所描绘的天安门前的玉带河、北大的红楼和图书馆、北海、什刹海、故宫角楼等，仍然为我们展现了近百年前的老北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城市风貌，勾勒出一幅在20世纪30年代，首都南迁后疮痍满目的北京城，呈现出了当时的革命者们活动的特定地理环境，表明了林道静等一批知识青年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是在一个怎样多灾多难的环境之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革命的正确性。在小说中，这种颓败风貌与北京城的巨大变化和焕发的新生机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构建起了小说独特的审美空间，让人在阅读之时不禁慨叹唏嘘，对人物的选择又有了新的理解，也让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看业已经过时，但其实际常常新，在不同时代读来，总会有不一样的心得体会。

不朽的青春之歌

杨沫对笔下的北京城始终充盈着澎湃又热烈的情感，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离世亦是在这里。她说：“北京把我抚养、教育成人，给我幸福、温暖，给我诸多的荣誉和新人，更给我一个一颗仍然年轻的心。……它时时催促我，命令我……要珍惜生命的一分一秒；它不大地提醒我应当如何回报北京。……我只有不停地挥动手中的笔。”青春应该是一首怎样的歌，杨沫用自己仅有的经历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那就是始终用自己的方式歌颂生活中的美好，鞭挞生活中的不公。战争年代，手榴弹随时准备向敌人殊死一搏的枪，而和平年代，手里握一支创作写作的“生花”妙笔。

杨沫的儿子卢青柯回忆母亲时说：“她一生只钟情两件事，革命与文学。”她曾是红军时期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她随丈夫卢嘉川参加了八路军军部；在解放战争中，她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新闻战士。1933年前后，在青岛的白区地下斗争中，她直接领导和间接听到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英勇斗争，守死不屈的革命精神。1937年卢卢桥事变之后，她在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先后从事冀中、北海、什刹海、故宫角楼等地，从事过妇女工作、宣传工作等，亲历过很多战友壮烈牺牲，被他们视死如归的行为震撼，并深受感动。她个人长期生活在敌区中心，形成了一座座丰碑。杨沫表示，“有机会以后我一定要将他们写出来”，“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出来，搬到‘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人永远记住这些英雄勇敢的同志们”。所以她一直坚持自己“要多写可歌可泣的人物，虽然她（或他们）各有不同的缺点”，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得真实可贵又扣人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

她由衷地感谢共产党于她走投无路之时，解救她于暗无天日之中，使她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之中看到了光明，并使她有勇气和力量在长期的残酷战争岁月坚持信念。也正是这份感激和信念成为了《青春之歌》这部小说的原始基础。对于这位曾写下“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和最佳”我国最优秀的影片之一”的文艺家来说，她对这本小说的最高愿望还是希望这部作品能赶上今天的艺术家知道过去的人们是如何斗争的，是如何失败的，是如何走向今天，那么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也许会对我们的今天的美好生活更珍惜一些。毕竟，“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自己。在创造卢嘉川、林道静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本人的精神世界仿佛升华了，仿佛飞到英雄的境界中”。所以她也希望她能成为读者们，她的导师和朋友，进一步领悟青春真正的意义。这份美好的期许，也是杨沫创作《青春之歌》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也使杨沫本人一直以青春的名义不朽。

杨沫在创作第一版《青春之歌》中比较重视人物成长的历史时间，而非具体的历史空间，因为在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史中，成长的主要是人，而非人物所在的环境。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她身处的环境并未与她一起成长，反而成为了她逃离和放弃的对象。到了第二版，也就是杨沫对小说进行修改时，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如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这时再审视小说人物所身处的环境时就会发现，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对旧社会北京城的“破败风貌”的描写能够更好地映射出北京城的“巨大变化”和“新生风貌”。于是杨沫在1969年12月《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中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二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识途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教授，本文原发于《文艺报》2024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